

经济、金融与基督教视角

JINGJI JINRONG YU JIDUJIAO SHIJIAO

林洁珍 黄元山·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经济、金融与基督教视角

JINGJI JINRONG YU JIDUJIAO SHIJIAO

林洁珍 黄元山·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金融与基督教视角/林洁珍,黄元山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ISBN 978-7-5520-0807-4

I. 经… II. ①林… ②黄… III. ①经济学-研究
②金融学-研究 IV. ①F0 ②F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2932 号

经济、金融与基督教视角

主 编:林洁珍 黄元山

责任编辑:董汉玲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9.75

插 页:2

字 数:158 千字

版 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807-4/F·286

定价:3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主流经济学与基督教信仰好像格格不入。按照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看法,经济学主要关乎客观科学分析,很少牵涉价值判断。经济分析基本上假设人是自利的经济人,只管效用极大化,公司则只求利润极大化。这些假设和思考方法与基督教的关爱精神好像充满了矛盾。但编者相信经济学与基督教信仰并无必然的冲突,反而可以互相弥补。

主流经济学以满足个人喜好为目的。经济学本身并未提供足够的价值及伦理规范,以界定及评价市场经济面对的各种伦理问题,比如市场经济是否是一个好的经济制度,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如何评价政府实行的各种经济政策等。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不可避免地牵涉价值判断,超越客观的经济学分析,需要引入经济学系统以外的价值观,用作伦理规范及评价准则。金融风暴清楚地暴露了自私的经济行为可以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而以自利为基础,不问道德价值的自由市场逐渐令人难以接受。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以及如何对个人经济行为作道德评价,成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基督教思想有着浓厚的道德伦理观,它重视人的尊严、公平正义及怜悯。从基督教视角建构经济制度可使经济体系及其中的活动更人性化,更能尊重及顾及贫困人的需要。从微观角度看,基督教的价值伦理观也能对个人的财富观、道德倾向,以至在市场的经济行为提供伦理准则。

另一方面,经济学也可以为一些基督徒所关心的经济及社会问题,如市场经济活动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贫穷和住房等问题,以及各种政策的成本代价计算等提供一些数据及经济分析,从而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问题,对具体的事实有更确切的认识。

经济学及基督教信仰之所以未能相互交流,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彼此认识不够,甚至有误解。为了促进双方的认识及了解,以至能彼此学习、互相补足,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于2011年12月举办了香港首

次基督徒经济学者论坛,其后在 2013 年及 2014 年也继续举办了第二次及第三次论坛。论坛聚集了香港的基督徒经济学者、神学工作者及在商界工作的从业人员,他们从经济及信仰角度检视现今的经济问题。

为了让更多人能分享论坛的成果,使更多人能认识及参与讨论,本书收集了这三次论坛的 14 篇重点文章,内容包括市场经济的运作、金融体系所牵涉的伦理问题,以及经济政策的讨论,既有从一般社会科学角度讨论的议题,又有从基督教视角去探讨及评价的相关议题。

本书分为四编。第一编收集了三篇研究市场经济制度问题的文章。第一篇文章中,林洁珍探索关于市场经济的伦理讨论,包括创造财富以改善民生、自由、公平正义及市场德性和文化,其指出基督教经济伦理与一般经济伦理的相近及不同之处。第二篇文章中,黄元山探讨了创效投资的出路和意义,如何可以一方面在财政上持续,有市场效益(赚钱),同时又有社会效益,以至可以把社会价值带回市场经济。第三篇文章中,宋恩荣从经济角度讨论实体经济全球化的三个渠道(贸易、投资及人口流动),特别着重于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所得分配可能引发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然后讨论国际金融活动的影响。

第二编的五篇文章都与经济、金融活动或金融市场有关,主要从经济理论及基督教视角分析金融市场的问题及信仰可能提供的出路。第四篇文章中,廖柏伟论述了从经济学视角看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源于各领域的信息不对称,提醒金融服务业的基督徒必须对市场的道德风险提高警惕,避免成为帮凶。在第五篇文章中,林洁珍从基督教伦理视角看自由经济主义及金融危机,分析自由经济主义与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关系,它们各自对自由及公平的定义,对私有制的看法,以及这两种思想的主要区别。第六篇文章中,冯国华先从财务学的角度,解释为何在理论上金融市场是美好的,然后分析究竟这一理论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今天的金融市场如此丑陋,最后从《圣经》中看其中核心的问题在哪里。第七篇文章中,黄元山分析了银行金融体制的信贷及杠杆化的资本如何导致贫富悬殊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建议,希望金融能为社会带来解决方案,而非更多问题。第八篇文章中,吴泽伟从信仰角度反思保险业,包括其理想功能及香港当下的具体制度缺失。

第三编的三篇文章从基督教视角看财富与贫穷问题。第九篇文章中,黄福光从《圣经》角度看对财富和灵性的追求,在成功神学与修道神学之外,提供更深刻的反思角度。第十篇文章中,赵其琨和汤立平从社会科学的

角度看金钱的诱惑与金钱智能,试图从社会科学得出的研究结果及《圣经》的启发,教导人们如何提升“金钱智慧(钱商)”。第十一篇文章中,伍伟亨从神学角度看贫穷,认为基督信仰对贫穷等社会问题的关注,首要的是忠诚于其独有的宗教灵性价值,而并非只是盲目地随着现代的政治社会议程起舞。

第四编收集了三篇讨论扶贫经济政策的文章。第十二篇文章中,王于渐介绍了如何用经济学方法在香港扶贫和解决老人贫困问题,建议用负所得税计划,也提议由“第三界别”机构和私营界别企业联手处理长远扶贫计划等社会目标。第十三篇文章中,廖柏伟对法定最低工资作了经济及伦理考虑,深入分析了推行法定最低工资会导致谁得益谁付代价,继而引用不同的伦理原则,包括基督教伦理来评价最低工资制度,认为社会应特别关注法定最低工资对弱势群体就业的负面影响。第十四篇文章中,余达心回应了最低工资的讨论,从神学及《圣经》角度界定合理工资,指出工人应得到让人活得有尊严的最低工资,认为“生活工资”是非常合理的。

希望本书能为经济学与信仰的交流和深入对话跨出有意义的一步,为经济学及市场经济注入高尚的道德元素,以此帮助读者对现今的经济问题作更精确的分析和评估。

谨此感谢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所长王于渐教授的支持,使基督徒经济学者论坛得以在研究所成功举行,感谢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张介教授积极参与论坛并为本书作序,感谢出版社董汉玲编辑的辛勤工作使本书得以早日面世。最后,衷心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陆晓禾教授的热心支持,作为优秀及经验丰富的经济伦理学者,她给了我们不少宝贵意见,并为本书作序,详尽及适切地把本书介绍给内地读者。

林洁珍、黄元山

作者简介

(排名按文章先后顺序)

林洁珍,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及香港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曾任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教授, 哈佛大学及普林斯顿神学院访问学者。现为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及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经济及商业伦理特约教授,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也曾担任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的编辑。公职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存款保障上诉审裁处成员, 香港会计师公会纪律小组成员, 前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及移民政策顾问。

黄元山, 中大全球政经硕士课程客席讲师、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中国商学院客席副教授。特区政府委任的公职包括金融发展局小组成员、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小组成员、禁毒基金投资小组委员。社会服务包括“健康空气行动”主席; 公益金分配委员会、投资委员会; 社联政策研究委员会; 香港社会创投基金董事等。国际投资银行前董事总经理。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 获耶鲁大学国际关系所东亚研究硕士学位、中大崇基神学院神学文凭、基督教研究硕士学位。著有《杠杆漩涡》和《金融黑洞》。

宋恩荣, 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博士(1979年), 现任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之沪港发展研究所联席所长,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及经济系客座教授, 并为东亚经济学会理事、《亚洲—太平洋经济文献》通信编辑、《中国评论: 大中华跨科学报》及《亚洲—太平洋商学学报》编委成员、《中国经济学报》学术委员。研究兴趣包括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之投资及贸易。曾著书九册, 编书六册, 并就研究专长发表众多论文。

廖柏伟, 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和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及经济学荣休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

长、经济学讲座教授及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创所所长,香港富布赖特杰出学者及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现兼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专长为应用经济学理论、不确定定理、劳动经济学、行政人员薪酬、金融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中国香港经济。

冯国华,生于香港。自毕业于培正中学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校园,攻读化学工程学士及硕士。之后在电池业工作了十年,取得一电池设计的专利。其后却发现,其兴趣不在工程,于是转而攻读财务,取得博士学位。现为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助理教授。

吴泽伟,现职为持牌的独立财策顾问(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自1979年从销售人寿保险开始至今已为客户的老、中、青三代进行财策。曾担任香港人寿保险从业员协会的执行委员和会长,保险代理注册委员会委员,新城财经台的客席主持。近年工余积极参与金融业作为社会公民责任的反省,又为各教会和社福机构主持理财讲座和工作坊。推动正确的理财观念,分析并恰当使用各种理财产品,为民众提供有效和简易的理财方法。

黄福光,先后在1990年及1998年获美国哈佛神学院神学硕士及神学博士学位;在研究院学习时,曾任哈佛神学院暑期语言计划之希伯来文讲师及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客席讲师。曾于吉隆坡伯特利浸信会、美国罗得岛州华人基督教会担任牧养工作,并于波士顿担任协助情绪不稳定青少年之工作。自2000年起任教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现为该院《旧约》教授。著有《旧约伦理》(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6年)及《生命时节:诗歌和智慧文学中的灵性追求》(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12年)。另外,与D. Yasharpour合著Haggadah of the Kaifeng Jews of China(Leiden: Brill, 2011)。

赵其琨,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系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策略及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拥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并活跃在本港人力资源管理界和工商业界。作为管理咨询顾问,在才俊管理、薪酬福利、员工心理咨询及劳资纠纷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专家级的服务。积极倡导在香港推崇完善的人力资源制度和与工作与生活平衡观念,并为香港多家小区团体和法定机构进行演讲。

汤立平,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凯斯西储大学获得工业与组织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教台湾大学心理学系。目前是美国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琼斯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国际应用心理学学会院士。研究领域包括人

力资源管理、金钱智慧和商业道德。发表超过 150 篇期刊论文、书籍章节和摘要。现(曾)任 11 个期刊的编辑审查委员,并为世界各地的 60 本期刊评审学术论文。还与 40 个国家(横跨六大洲)的学者合作。其研究被期刊和教材广泛引用。

伍伟亨,基督教神学工作者,受业于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及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分别取得道学硕士及神学博士学位。2010 年获 The John Templeton Award for Theological Promise 神学奖项,著有作品 *Die Leidenschaft der Liebe. Schelers Liebesbegriff als eine Antwort auf Nietzsches Kritik an der christlichen Moral und seine soteriologische Bedeutung*,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2009。近年研究主要关注现代基督教信仰的灵性探索。

王于渐,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及黄千亨黄英豪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首席副校长。于 1987 年创立香港经济研究中心,推动有关香港经济政策问题研究;并于《信报》及《南华早报》撰写每周政经评论专栏。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关于产业、房屋、劳动力和人口的政治经济以及香港深层次矛盾,出版《香港深层次矛盾》《香港长远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香港奇迹已经幻灭?》《芝大经济学派与市场社会秩序》等书。

余达心,中国神学研究院神学科教授。早年毕业于福乐神学院,获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学位。1975 年返港参与创立中国神学研究院,其后赴英国深造,1981 年获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中国神学研究院。1984—1994 年间,任教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全力协助该院成立宗教及哲学系。1994—2007 年,出任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一职,2007—2013 年任院长。2013 年 7 月,获爱丁堡大学颁授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序 言

如主编在编者的话中所表明的,本书“相信经济学与基督教信仰并无必然的冲突,反而可以互相弥补。”我认为,这种互相弥补关系的历史根据,可溯至资本主义经济最初发展,如本书主编和作者之一林洁珍教授在文中所说:“基督教伦理思想曾在自由经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对内地读者来说,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斯·韦伯的发现:新教伦理与隐藏在16-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着生成关系,新教伦理产生了有利于合理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发展的影响,“它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①而按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研究,这种关系还可溯至更早些。“6世纪的本尼迪克特修道院是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对僧侣来说,劳动是他们的一项基本工作。他们深信,通过共同生活、有组织的劳动、祈祷和再创造,他们将更接近上帝。为了有充分的时间祈祷和沉思,他们发展出了节省劳动的设备、劳动的标准化,以便僧侣兄弟之间有可能持续工作。他们勤俭生活的结果是,节省了金钱,用增值的财富造出更好的设备,因此他们被称为‘最早的资本家’”。^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本尼迪克特修道院生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作过重要比较。他认为,通过弘扬宗教热情,激发了个人创造性,“劳动即祈祷”,本尼迪克特僧侣对劳动的态度影响了整个中世纪。^③德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将这种由基督教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概括为个体化、主体化特别是理性化。他认为,正是这三种精神特征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三个结构特征: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值以及市场和价格体

①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② Lewis Mumford: *Techniques and Civilizatio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p.14.

③ 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p.226.

系的协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科斯洛夫斯基肯定了韦伯所指出的,合法性论证的理论与经济上追求成功,特别是在加尔文主义中存在的这种关系,但他批评韦伯,“过分夸大了基督教当中的教派差别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而对于基督教来讲整体上是共同的特征,即个体化、独立化和理性化,则退居次要地位了”。^①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经济三个结构特征有紧密联系的这三个精神特征,是所有基督教派都共同具有的特征,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基督教本身的根据中产生的。例如,“在这样的句子‘基督解放了你们,使你们获得了自由’当中,基督教主体性的激情发生了效用,这激情首先指的是与‘法则’相对的主体的道德独立性,但也不局限于这种独立性因素。”^②

但是,由基督教所孕育和激发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由僧侣们所发展和创造的这种初始的“自由劳动的合理的资本主义组织”,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出现了被称为从神学从基督教“解放”或者说摆脱的过程,发生了所谓的“经济独立化过程”,即商业的动机结构从宗教和文化的准则中脱离出来的过程。^③韦伯和科斯洛夫斯基似乎都认为,这样一种摆脱宗教和文化的过程是无可避免的。例如,韦伯认为,一是因为,宗教必然产生的勤奋与节俭会导致财富的增加,而随着财富的增加,骄傲、愤怒以及各种世俗的爱也将增加,结果寻找天国的热忱就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就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二是因为,“当禁欲主义从修道院密室中出来并开始支配世俗道德观念时,就在建设现代经济秩序中发挥作用,但当这个秩序与机器生产的各种技术、经济条件结合在一起时,就以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决定着今天所有生而处于这种机制之中的个人的生活”,原来它以为对于外在物的关心像披在圣者身上的薄外衣,可以随时扔到一边,却没有想到,这种轻裘现在变成了铁笼。^④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地认为,广泛的技术和社会改革,在承认天主教道德体系的前提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合同自由和技术革新系统的资本主义历史地要求减弱严肃论的道德”。^⑤所以,他认为,尽管基督教整体具有的精神特征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三个结构特征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却历史地要求经济联

^{①②③⑤}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8、11页。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2页。

系从社会文化准则中脱离出来,从而有利于更强大的经济自身规律的跃动。

不过,尽管“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经济独立化的过程”,尽管“胜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它的支持”,基督教却始终关注着这个已经渐行渐远的独眼巨人,担忧着它的横冲直撞迷失方向,抚慰着被它撞倒抛下的伤者弱者,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从未停止对社会公义和资本主义道德问题的关注。今天已经成为“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不能忽略的全球现实”的经济伦理运动及其学科,按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狄乔治(Richard T. De George)的研究,最早就是从神学和宗教的角度发轫的。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历代教皇在他们的社会通谕中就提出了有关公平工资和资本主义的道德问题。这些经文形成天主教社会伦理包括企业伦理的基础。在后来经济伦理学成为逐步壮大的社会运动中,宗教思想家、神学家、教会始终是这个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提出和研究了大量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意义的重要问题和观点:例如,作为现代企业组织普遍形式的公司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具有超越唯利润最大化的视野和价值观?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正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全球化中的经济正义问题?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加强经济和公共决策的伦理基础?什么是成功、正义和真正的发展?宗教和传统文化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能够为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指导和帮助?宗教思想家、神学家和教会并没有听任经济独立化或社会和经济文化经济化,而是以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即反对这种经济化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在深入具体地研究这些新挑战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强调人类整体和长远的价值观导向,提出了被经济独立化的资本主义所忽略、今天看来仍极为重要的生态问题、人的优先权问题,特别是教皇保罗二世提出的“真正的发展是人和人的发展,这种发展尊重和促进整个人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种全面的发展观。这些重要问题和观点的提出促进了经济、人文与宗教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从业者之间的广泛对话和交流。可以这样说,西方经济伦理学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对工商学院、企业管理制度、政府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反思和改善,与教会、宗教伦理及其社会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反社会和经济文化经济化,一定要求跨学科跨领域全面整体地看问题,否则人文学科、宗教文化的视野仍然被企业和经济学拒之门外,也因此促进了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出现。所以,反社会和经济文化经济化,可以说,是对西方历史上影响至今的经济独立化过程的一种纠偏,一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全面观点的指向。韦伯当年只是意识到追求财富失去宗教

和伦理意义后带来的后果,至于未来,究竟是出现面貌一新的先知,或者旧观念旧理想的复兴,还是病态的以自我陶醉为粉饰的机械僵尸,他认为没有人能作出准确的预言。但从上述反社会和文化的经济化的努力中可以看到,今天以及未来,并非这三者之一的结局,而是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的,对过去加以把握、发展和提高。把握就是使它成为我们所有,而成为我们所有,就是使它具有了不同于从前的特性。这也可以理解为,经济摆脱宗教和文化的独立化过程中所取得的物质积累,只有吸收成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时,才能在改变它们的狭隘和异化的特性的同时得到保存和提高。所以现在说要使市场经济“civilized”、市场经济要嵌入公民社会中、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和伦理规范等等,反映的就是要对这种独立化结果的拨乱反正,就是要用经济伦理的方式、公民化的方式改变从而保存和提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技术的和经济的文明成果。而这个把握、发展和提高的我们主体,应该拥有对我们自己、生命、世界、善恶的认识和智慧,对我们自身以及未来具有信念和洞察,能够直面各种困境和挑战,保持希望和自信。1998年德国教授齐默利(Walther Zimmerli)提出,经济交换的全球化给人的印象是,人类的价值与行为型式迟早将汇合成一种世界文化,但事实上,这种汇合只停留在表面,并未涉及不同文化的根本价值体系。^①我认为,不同社会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价值体系就是这种最深层的根本体系,它是滋养、怀抱和支撑这个社会或民族的最绵延深厚的精神根基。

谈到宗教的作用,内地读者通常会记得我们过去对宗教的经典解释,即“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劳苦大众的精神毒药”。列宁把马克思的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表述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并认为“这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②我们过去的解释则进一步定性为是统治阶级的精神毒药。实际上马克思的原话(和黑体字)是:“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③显然,这段话里,马克思的矛头是指向造成宗教里的苦难的现实的苦难,是使得被压迫生灵叹息的无情世界和无精神

① 转引自陆晓禾:《经济伦理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44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活力的制度,而不是作为现实苦难的表现、对现实苦难的抗议的宗教。正是在这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与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的不同就在于,不是否定宗教及其它对现实苦难的表现、抗议和缓解的作用,而是揭示了造成现实苦难的社会根源,认为应当改变产生需要宗教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否定宗教的存在和作用。特别为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是,他注意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①认为,宗教在与国家政权分离后,正是宗教回归它本来意义而为政治国家的成员所真正需要,因为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成为市民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这种原子概念的利己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真正的人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公民形式上,所以“宗教仍然是这种国家的成员的理想、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宗教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②至于现代社会如何现实地解决这种利己的人与真正公民的人的分裂,马克思那时还没有后来明确提出的解决办法,但他赞成卢梭表述的基本方向,即:把每个本身是完善的单独的整体的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有能力用局部的道德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存在。^③也就是说,要超越这种肉体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体性,而作为社会的人类整体的一部分、作为真正的人类公民而存在。我认为,尽管宗教不可能提出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现实的解放道路,但就这个理想而言,应该而且能够包含宗教在提升人的这种社会性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方面广泛而持久的贡献。

一如在西方,可能在中国,即便承认宗教对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责任具有重要的作用,也不太赞成宗教参与对经济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许多人认为,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技术的有自身规律的,而宗教信仰或观点并不能取代对事实问题的研究。但是,正如美国基督教社会伦理学教授沃葛曼(J. Philip Wogaman)所说,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总是涉及事实和价值两个方面。如果需要事实专家处理事实方面,那么也需要明确最后采取的价值观。宗教对价值观问题有许多可说的。^④很久以来,宗教就认为,日常生

①②③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6、46页。

④ Oliver F. Williams and John W. Houck eds., *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Visi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1.

活并非善恶中立的,例如基督教先知的作用就是揭示和帮助人们认识日常生活与善恶之间的关系。20世纪以后,神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家承认难以跟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变化,但如上面提到的,仍积极努力地用基督教观点来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种经济问题。例如,在经济生活中,各种价值应当孰先孰后?经济制度、政策和实践究竟应当基于个人主义还是社群、社会整体?社会问题应当归结为经济制度或结构还是个人真实的责任心?显然,这些“应当”问题并不是诉诸经济学或经济规律可以解决的。实际上,对宗教的误解涉及对宗教的社会的和认识的定位问题。宗教与科学、艺术和道德一样,也是人类把握世界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但与科学是对世界的事实把握不同,而与艺术和道德是对世界的价值把握相同的是,宗教强调的不是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而是“外物对主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①不过,与艺术和道德不同,宗教是用信仰来把握世界、通过信仰来实现自己的一种价值方式。所以,可否这样认为,宗教所依靠的信仰不是“颠倒世界的反映”,而是包含着“应该”、“理想”的价值要求,这种要求不仅是现实苦难的表现、抗议,而且是超越、消除这种苦难的要求。尽管它的这种要求的途径可能被认为是非现实的,但这并不能否定它的正当性和规范性。人们不仅能够通过对神的信仰在个人或社会对现实的苦难还无能为力的时候托起生命的沉重,而且能够通过对神的信仰包含的“应该”、“理想”的价值追求来评价和改善现实的人类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及其实践。所以信仰、价值观未必是“虚幻的”。道德不一定是宗教的,但宗教一定包含道德的,作为道德价值取向内蕴在宗教信仰中、作为道德规范直接体现在宗教戒律中,而由于信仰的力量,宗教道德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的作用,相比世俗的道德作用更大和更深入。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最近三年连续三届基督教徒经济学者论坛的研究成果。如主编所介绍的,这样的论坛在香港也是首次创办。就我所知,明确从基督教视角来研究市场、经济,特别是反思金融危机的专门论文集在国内似乎还没有。就国际文献而言,也缺乏在这方面专门的中文研究成果。所以,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来看,这本论文集都可说作出了新的贡献。本书作者是具有基督教信仰同时又是经济学、金融学、财务学、管理学、决策学、社会学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不仅

① 黄云明:《宗教经济伦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对各自的专业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更广阔的愿景和把握世界的价值观能力。作者们对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主导方式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更具影响的金融市场及其与此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从基督教视角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述,提出和探讨了在狭隘的主流经济学中不可能处理但实际上无法回避的重要的经济伦理问题,例如:效率应否视为绝对或唯一的价值?财富创造和效率是否经济生活的终极目标?市场经济所允许的自由是谁的自由,是否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交换公义、与慈爱分割的公义是否真正的公义?如何看待加强监管却不断重复发生的金融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资产价值”这一财务学的基本准则是否能够成立,成立的根据是什么,是否财富愈多,快乐就愈多?贫富悬殊是否无可避免的分配结果?灵性追求和财富追求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等等。对内地经济伦理学者以及读者来说,本书特别是基于世界以及香港的市场经济、金融体制以及政策状况,提出了以前我们没有提出或深入讨论的问题,如基督教经济伦理与一般经济伦理的区别与联系,金融市场与信仰,金融市场与道德风险,金融危机与基督教伦理,财务伦理与信仰,金融体制与贫富差距,保险与信仰以及基督教视野中的扶贫政策等,不仅从理论层面上阐发了基督教对这些问题的观点,而且在实践层面上提出了可推进对这些问题改善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转型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了,也就是说,无论是公有制经济、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市场为导向,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提供用来获得更多交换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西方市场经济和香港市场经济碰到的许多经济伦理问题,我国内地的市场经济也会碰到,例如,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人的优先权问题、真正发展的问题、社会和文化在经济化问题等等。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观指导,其中包含了本书论及的自由、平等、公正、敬业、诚信、友善等重要价值观。了解基督教有关这些重要的价值观的概念和解释,不仅有助于愈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不同信仰和传统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交往和共同生活,而且有助于借鉴和吸取他们的有益成果和经验,拓宽和深化我们对这些价值观的认识和把握。

我与本书主编和作者之一的林洁珍教授相识于21年前的中英澳暑期

哲学学院应用伦理学研讨班,知道作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和香港浸会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她,同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此后 20 多年的学术交往中,一直深深敬佩她对于专业和信仰的认真执着,同时也感谢她在推进香港与内地学者之间的经济伦理学研究和交流方面的率先作用、作为中国学者对国际经济伦理学界及其专业期刊的重要影响和贡献,特别是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的客座教授,对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论文集的大力支持。在收到她要我写序言的邀请后,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难当此任,谨以这篇由本书引起的我的上述思考文字,表达我对她以及本书作者的尊敬和感谢,同时也期望引起国内同仁的兴趣和重视。

陆晓禾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执行委员

2015 年 5 月